

探讨史学理论(狭义的,即历史学家对历史学这门学科自身的认知)。如果他计划中的《十论书》由构想化为现实,那就全面了,但历史从来没有“如果”一说。无论如何,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应当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史册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其三,由《论历史研究的对象》联想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尤其是它的代表人物 E. P. 汤普森。放开眼界,从横向来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虽一度深受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但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革故鼎新,一边吸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一边借鉴当代海外史学界的成就,走上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新路,这从刘大年 1985 年率团出席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良好反响,足可证明。

刘大年在 1978 年至 20 世纪末活跃于史坛,这也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且出彩的时期。据我个人考察,刘大年与 E. P. 汤普森,这一中一西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那种对现实的关注,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情怀,是如此地相同;刘大年在抗日战争中当过一年多八路军战士,在前线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张海鹏称其为“战士型的学者、学者型的战士”,E. P. 汤普森也在二战中“投笔从戎”,走上前线,当过三年战士,抗击德意法西斯,也是个“战士型的学者、学者型的战士”;他们两人对马克思及其唯物史观的守望,更是如出一辙。且看:1992 年 3 月 4 日,这位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E. P. 汤普森,已沉痾缠身,在抱病接受中国学者刘为的访问时声言:“我仍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久后,他与世长辞,留下的这句声言超越时空,7 年后,与 1999 年 9 月 24 日刘大年的声音合拍,响遏行云,在历史的长空中久久回荡……

行文至此,时已深夜。搁下笔,在阳台上望着初秋的夜晚,只见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星座里,群星闪耀,我们找到了守望者 E. P. 汤普森,也找到了守望者刘大年……

求真求实 学者本色

——追忆大年同志与抗战史研究

王建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中,近代史研究所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其厚重扎实的学风中不乏创新的敏锐与灵气,求真求实的精神自然地流淌于学问之间。近代史所的这一优良学风是一代代前辈学者以言以行而铸就而传承的。刘大年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

我于 1986 年进入近代史所。作为晚生后辈,在最初的几年中,我与大年同志少有见面。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因参加大年同志组织编写的《中国复兴枢纽》一书的写作,才有了与他直接接触的机会。当时,为纪念抗战胜利 50 周年,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组织编写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大年同志出任编委会主任。除统筹全套丛书的规划外,大年同志对被称为“丛书之纲”的《中国复兴枢纽》一书投入了较大精力。该书的初稿系由多家单位的研究人员写成,大年同志对初稿质量不太满意,遂从近代史研究所抽调一批研究人员进行改写和补写。当时尚称中青年研究者的姜涛、闻黎明、杨

奎松、马勇和我被征召进入写作小组。写作小组曾专门集中了一段时间,在北京市政府宽沟招待所专事此书的写作。在此书的写作及修改过程中,大年同志多次参加讨论,提出指导性意见,并直接动笔修改。这段经历,使我对大年同志有了不同于以往的了解。此前的大年形象,是我从史书中获得的。经历了这些谈话和讨论之后,这一形象更加真切、丰满,也更为准确。

作为一位享有盛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前辈,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在我此前的认知中,大年同志大概会对一些早已形成的有关抗日战争的政治性结论比较坚持。结果发现,这一想象是错误的。大年同志在组织抗日战争史丛书的过程中,充分展现出一个史学大师的目光和胸襟,展现出一个学者的本色,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勇于修正以往一些已被证明是不太准确的结论。这对一个普通学者或许不算什么,但对一个成名已久的史学权威、一个承担着政治责任的重要学术组织者来说,则需要相当的学术责任感和学术勇气。

在该书写作和修改过程中,大年同志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思想。比如,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互相依托、缺一不可;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复兴的枢纽等等。这些观点在今天已是学界主流意见,但在当时,虽已有学者提出,但难称主流,甚至还会被一些人视为异端。大年同志肯定并有力地阐述这些观点,颇令我感到意外。

大年同志还对该书的具体写法提出了一些意见,令人耳目一新。在此前的抗战史著作中,战国国共摩擦、三次反共高潮等总是浓墨重彩地花较大篇幅来描述,批评国民党反共重于抗日,但大年同志提出,抗日战争主要是一场民族抵抗战争,中国军民如何抵抗日本侵略应是本书重点描述的内容。国民党虽然在不同时期有反共行为,但它终究还是把抗日放在第一位的。因此,在该书中,国共摩擦要写,但不必花大篇幅去写。又如,毛泽东同志对于抗战有许多论断,一些人在写作中习惯把毛泽东的话大段引用,以增加其叙述的权威性。大年同志认为,过多引用《毛选》的写法并不好,他提出,“删去不必要的《毛选》引文、相关的注脚,有些必须照用的评论也不保留引文形式,适当变通”。他主张该书的写作应区别于党史的写法。^①

参加该书写作和修改讨论的,除了本所的同事外,还有几位来自党史、军事史研究部门的专家。对于大年同志的这些主张,绝大部分参与者都是认同的,但也有人存有疑虑。如对正面战场的肯定评价、国民党的领导作用以及抗日战争能否称为中国复兴枢纽等,有人提出这些观点在政治上是否稳妥的疑问。讨论中,甚至有人开玩笑般地提醒:大年同志,你是主编,你的影响大,将来本书万一出了差池,责任可是你担着了。大年同志显然已有定见,未在其基本观点上有任何动摇。在他的直接指导下,《中国复兴枢纽》一书几经修改后面世。在我和许多同行看来,这本凝聚了大年同志心血的作品,确实超越了此前的同类著作(今天看来,甚至还超越了后来出版的一些著作),是一部优秀的抗战史论著。

二

几次面谈或讨论的印象虽然深刻,但毕竟事已久远,记忆零碎,难免出现讹误。写这篇纪念小文时,我又重翻了大年同志在那几年中发表的有关抗战研究的文章,以避免记忆的讹误和片面,确保言之有据。这些文字,有些他曾在谈话中不断强调,有些则仅仅是在文章中写出。无论是哪种,读到这些文字,我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大年同志当时的形象来,甚至都能从字句中读出他特有的音调来。

^① 《致张振鹍》(1996年8月16日),王玉璞、朱薇编:《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48页。

简要说来,大年同志对于抗战史研究的主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者有如下四点:

(一)坚持抗日战争研究必须是科学研究

众所周知,大年同志是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的发起者和首任会长,是他向中央提出了建立抗日战争史学会的提议。抗日战争研究也是他晚年着力最多的一项研究。大年同志认为,以往的抗日战争研究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仍有诸多不足,应当注重抗战史研究的科学性。“抗日战争的历史和整部中国历史一样必须成为科学的客观研究的对象。我们必须把抗日战争的研究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提高它的科学性。”^①他指出:“抗日战争研究是科学研究,科学研究的头一条就在于遵守事实,保持客观性。研究抗日战争,从根本上说,保持客观性与怀抱爱国主义,绝无矛盾,只有天然一致。”^②

(二)要全面、准确地研究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大年同志主张,应当对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给予恰如其分的肯定。他认为,抗日战争爆发前,国家权力基本掌握在蒋介石、国民党和其他派系手里。有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参加,才有了全民族的抗战。否则全民族的抗战就无从实现,一时实现了也无法坚持下去。“从这方面看,那些低估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不全面的。”他同时指出,抗日战争以中国的胜利而结束,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人民力量的兴起是基本条件之一。这个基本条件的作用贯穿在抗战的全过程里。没有这个基本条件,全民族抗战无法实现,蒋介石就只会“攘外必先安内”的路上走下去;或者即使全民族抗战一时实现了,中国能否取得胜利,那也是一个大问号,“从这方面看,那些低估这个基本条件的说法同样是不正确、不全面的”。^③

1995年8月15日,大年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民族的胜利 人民的胜利》一文。文章第二节的标题异常醒目:“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是国民党、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取得的”,该节论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大年同志指出,通过国共两党的合作,“中国内部新的团结格局由此确定下来。全国各阶级、各民族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救亡。中华民族使自己的觉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抗日战争就是这样实现的和虽然经历惊涛骇浪终于坚持到底了的。从双方合作奠定抗日战争的基础来看,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是基本相同的。它们这时都站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关键位置上,力挽日本军国主义汹涌而来的狂澜。这是历史事实。”

大年同志还认为,由于当时的情况是敌强我弱,困难矛盾颇多,“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中,没有哪个阶级、哪个政治力量能够独力担负起领导这场伟大战争的任务。国民党独力担负不起来,共产党独力担负不起来,其他社会力量也担负不起来。”抗日战争取得了最终胜利,“这说明国民党、共产党的领导都是需要的,不可缺少的。它们都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做出了载诸史册的贡献。”^④

(三)对一些沿用已久的说法进行重新思考

大年同志不囿成见,对于一些人们习以为常但其实并不准确的说法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如对“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四大家族”这几个多年沿用的名词,他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这几个词的出现虽自有道理,“但我们现在是讲大后方的经济,此时此地,一一照搬,明显地窒碍难通”。他认为,“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并不是相对应相对立的两个概念,民族资本的对面应是非民族的或外国资本;“官僚”的定位应是私人或个人,但现在所说的官僚资本企业,并非全属个人所有,

① 刘大年:《照唯物论思考》,《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第3页。

② 刘大年:《抗日战争时代》,“题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③ 刘大年:《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与民族精神》,《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4期,第1页。

④ 刘大年:《照唯物论思考》,《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第29页。

其中大部分不属于私人所有,而是国家财产。因此,用“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来相对立,相区别,对两者的表述都不确切,尤其是对“官僚资本”的定性不当,没有表明它的所有权归谁。有鉴于此,大年同志对修改稿做了这样的改变:将“民族资本”改为“民营企业”,“官僚资本”改为“官营企业”或“官营资本”。^①

(四)必须以唯物论辩证法指导抗战史研究

大年同志既不赞成思想僵化,又反对轻率地否定本来正确的东西。那么,如何去研究抗日战争所呈现的各种复杂问题,使自己免陷片面呢?大年同志提出的办法是“照唯物论思考”。

大年同志在《照唯物论思考》这篇文章中指出了抗战史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顾虑把共产党地位、作用降低了的,有之;顾虑把国民党的地位、作用降低了的,同样有之。以前一些讲抗日战争的论著,多半强调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近来有些论著又一下子把两者的位置颠倒过去,从一个片面走到了另一个片面。他认为,这些问题的症结,都在于看不见事物固有的矛盾,缺少辩证法。他还指出,正视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绝不意味着忽视统治阶级、当权人物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唯物论辩证法的功能,就是引导人们去认识事物的本质,而又分辨出它的界限在哪里。

大年同志认为,用唯物论辩证法来分析,便会看到中国抗日阵营特有的格局,这个格局就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并存、民族革命战争与民主革命两个任务并存,国民党与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并存。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独一无二,在反法西斯同盟国中也是独一无二的。要看到蒋介石虽然在抗日战争中有动摇性,但蒋政权到底站在民族立场上把抗日战争坚持到胜利了,“排除了蒋介石、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全民抗战也就不存在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是人民力量的组织者、鼓舞者、坚定的政治代言人。中国能够坚持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其力量的根基就在全国广大人民中间。“排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抗日战争力量的深厚根基也就不存在了。”因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说国民党、共产党各自起了领导抗日战争的全局性作用,而它们所起作用的方面和重点不同,合乎事实”。^②

三

作为大师级学者,大年同志对推进抗战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所提出的若干观点已成为今天的主流观点。作为优秀的政治活动家和学术组织者,他对于抗战史研究获得全社会的重视,以致成为今天的“显学”,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的建立、《抗日战争研究》的创刊及若干次重大的学术交流活动,都凝聚着大年同志的心血。

大年同志如此重视抗日战争史研究,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一研究对于铸造民族精神、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因此,他不仅在学界努力推进抗战史的研究,还积极致力于推动社会各界对抗战这段历史的关注。

1995年5月,大年同志与抗战史学会执行会长白介夫同志联名致信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对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的安排提出两项建议:一是在8月15日那天,请江泽民同志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到卢沟桥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去视察,“哪怕10分钟也好”,以此提醒全国人民记住抗战历史和抗战胜利的意义;一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一项法律,规定每年8月15日为抗战胜利纪

^① 《致张振鹂》(1996年8月16日),《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下,第649—650页。

^② 刘大年:《照唯物论思考》,《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第28、27页。

念日，“用国家立法形式把它作为节日规定下去，传之后代”。^①当年8月15日，国家主席江泽民视察了抗战纪念馆和卢沟桥。这是我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视察抗战纪念馆。此后，国家领导人多次到馆视察，抗战纪念馆成为我国重要的抗战纪念仪式举办场所。19年后，大年同志的另一提议得以实现。2014年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确定每年8月15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大年同志在其晚年仍孜孜不倦地学习、思考和探索，这一永无止境的求真求实，显示了他的学者本色。他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总序中写道：“就像历史本身永无穷期那样，人们认识历史至少一些方面也无穷期，以致终究要留下难以弥补的缺陷。这只会促使有志者去勇于探索，发现真理，而不会裹足不前。”这是大年同志在晚年对他自己的鞭策，也是对历史研究后来者永恒的期待。

我相信，我和近代史所的同仁们一定不会辜负这一期待。近代史所严谨求实的学风定会代代相传。

刘大年《评近代经学》的学术价值

李 建 傅永聚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国学院）

在现代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者与所谓的西化派及文化保守主义者都对孔子、儒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不同程度、不同视域的关注。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刘大年先生亦不例外，他的晚年著作《评近代经学》，对近代经学进行了宏阔、深邃、缜密、独到及精辟的思考和论述，是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念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典范。但迄今为止，其近代经学研究在学界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这对于儒学及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对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探讨以及当前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刘大年《评近代经学》的学术价值是多方面的，本文拟从近代经学开端问题、近代经学研究的方法论、近代经学研究的重心及现实指向三个方面试做评述。

一

近代经学的开端问题，虽不是《评近代经学》关注的重心，但却是刘大年近代经学研究独具匠心的一个关键切入点。他的致思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而展开：

第一，龚自珍、魏源与庄存与、刘逢禄孰可标志近代经学的开端。刘大年认为，庄存与今文经学著作讨论的问题，对近代经学毫无影响。刘逢禄闻名，是因为所著《左氏春秋考证》否定古文学，成为近代今、古文学斗争的焦点之一。龚自珍、魏源向刘逢禄学到的仅是今文经学文献知识，思想上与其并非一脉相联。龚、魏学问的重点在于社会现实问题，而这正是刘逢禄极力回避、不敢碰触的。乾嘉今、古文两派尽管存在诸多相异处，但在拘于书本、远离现实这一点上有着一致的表现。近代今文经学则与之有别，它集中反映着当时急剧变动的社会结构和激烈斗争的现实矛盾。这是刘大年在回应美国学者艾尔曼所著《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一书中，关于近代今文经学开端于庄存与、刘逢禄，因而“必须从研究‘康梁’转为研究‘庄刘’”^②时提出

^① 《致江泽民》（1995年5月15日），《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下，第622—623页。

^② 刘大年：《评近代经学》，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1辑，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